

名 / 校 / 名 / 师 / 名 / 课 / 实 / 录



冯天瑜 著

中国人文传统与 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

湖南教育出版社

名 校 名 师 名 课 实 录

冯天瑜 著

中国人文传统与 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 / 冯天瑜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55-7155-7

I. ①中… II. ①冯… III. ①文化史—对比研究—中国、西方国家—文集 IV. ①K203-53②K50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4596号

名校名师名课

中国人文传统与中西人文精神讲演录

冯天瑜 著

责任编辑: 蒋 芳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443 号)

网 址: <http://www.hneph.com> <http://www.shoulai.cn>

电子邮箱: 228411705@qq.com

客 服: 电话 0731-85486742 QQ 2284117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印刷厂印刷

710×1000 16开 印张: 20.75 字数: 2738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55-7155-7

定价: 35.50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略论中西人文精神	1
中国人文传统五题	12
弁言	12
中国人文传统（一）——“人文”与“无疆”契合	16
中国人文传统（二）——虚置彼岸，挺著此岸	25
中国人文传统（三）——伦理中必与经世取向	39
中国人文传统（四）——一体两翼的“民本”与“尊君”	51
中国人文传统（五）——“敬祖”与“重史”	69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	78
东方智慧与“现代病”疗治	
——从池田大作“依正不二”观说开去	91
“五伦”说与和谐文化	107
民主理念内在根源考辨	
——以《明夷待访录》为例	116
晚清近代化方略论析	
——以张之洞《劝学篇》及何启、胡礼垣《〈劝学篇〉书后》为例 ...	146
历史文化语义学简议	163
“科学”：概念的古今转换与中外对接	168

“封建”概念的再认识	179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反封建”命题论析	192
中国近代政治话语的建立	
——以“革命”、“共和”为例	214
汉译佛教词语刍议	233
汉字文化对日本的深广影响	246
辩才无碍	268
对于时下清宫戏历史观的评析	272
草根性、人文精神与文化创新	276
社会心理与历史进程	281
中日关系的文化解读	288
三画册昭显人文精神	294
璀璨的人文星座——陈立言《历代文星图赞》	294
返本开新 追寻大美——周韶华《荆楚狂歌》	298
智者乐水 仁者乐山——何冠智《水墨画集》	302
国学与人文教育	304
清廉——人文精神的题中之义	308
近世鄂东人文兴盛原因探略	310
中国文化人的三个发展阶段	316

略论中西人文精神^①

—

近 10 年来,“人文精神”、“人文关怀”、“人文传统”逐渐成为知识界的常见话语。据笔者并不周详的回顾,这一议题大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文化讨论方兴未艾之际,一些人文学者在探索中国文化特质时提出的。笔者 1986 年参加在上海举行的“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中外学者的发言多有涉及中国人文传统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的异同问题。^②在此前后,《光明日报》等刊物曾就中国人文传统的内涵与近代欧洲人文思潮的差别展开讨论。至 90 年代初,文学评论界在《上海文学》、《读书》、《东方》诸刊发出拯救“人文精神危机”的呼声,认为“人文精神的失落是今天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并从中国文学现状的分析入手,指出当下中国也呈现人文精神低迷的态势,因而

① 1997 年 5 月在武汉大学研究生会讲演。

② 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1986 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有必要重建人文传统。^①也有论者对此表示异议，如作家王蒙（1934— ）在《人文精神偶感》^②中说，中国本来就没有人文精神，何来“失落”可言？王蒙所谓中国本来即无的人文精神，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美国诗人惠特曼（1810—1892）力倡的以自由民主为内涵的人文精神。王氏的逻辑是，中国本来并无的东西，“重建”从何说起？“既然从未拥有，何来天长地久？”现在应当发扬的是与商品经济顺应的市场法则。又有论者起而反驳王说，认为中国不仅自先秦以降即有人文传统，而且“五四”以来的科学、民主、人道的新传统岂能一笔抹杀。今日呼唤“重建”人文精神，不仅有现实针对性，而且有历史渊源，并非空穴来风。^③还有论者指出，人文主义的旨意是“反恶”，而“恶”（物欲等等）是在社会进步中出现的。现今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贫穷和极“左”的威胁，故我们主张的人文主义必须有历史的维度，是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保证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去提供一种开放的人文主义，它是历史的、宽容的、民主的和诗意的，不是独裁的、专制的、僵死的和教条的。^④总之，各种意见相反而又相成，使议论渐趋深入。而作家张承志（1948— ）等人则以张大人文精神为自己的创作旨趣，构成90年代一个不可小视的文学现象。文学界对民众的直接影响力，向来比学术界为大，故随着文学界讨论的开展和创作实践的运行，“人文精神”这一论题在90年代似有走出象牙塔的趋势。

二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人文精神”从一个相当专业化的思想史术语，开始向大众话语（目前还限于知识界大众）转化，

① 见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读书》1994年第3期。

② 《东方》1994年第5期。

③ 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1996年2月版。

④ 见童庆炳：《人文主义的历史维度》，1996年第2期《文学自由谈》。

这并非仅由少数论者的倡导所致，其背后有着时势的驱动。

近 20 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商品经济大潮涌动，古老的中华大地经历着一场深度与广度均属空前的社会转型，其内容包括三个层次：其一，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这一过程自 19 世纪中叶已经开始，时下又赢得加速度），这种经济形态的变化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其二，从国家统制式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化，这种经济体制的改轨与上述经济形态的变化同时并进，正是现代转型的“中国特色”所在；其三，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正在进行的这一转变所诱发出问题，有全球化趋势，当下中国也不可回避地面临此类问题，诸如环境问题、人的意义危机问题、诸文明间的冲突问题，等等，这又增添了转型的普世性内容和现代性品格。

内涵丰富的中国现代转型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由自然经济和吃“大锅饭”导致的迂缓、消极的行为方式及心理定势，逐渐被追求效益和效率所取代；人际关系摆脱人身依附，代之以契约精神；自由创造、公平竞争成为人们新的思想动力和测量社会公正的准绳。这些都意味着，10 余年改革开放的实绩，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与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上，而且也带来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的历史性进步，造成人的理性精神的新觉醒。这正是人文传统获得现代性转换的新土壤。对于现代转型带来的这种积极效应，我们应当有充分估量。然而，与此同时，社会转型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价值观念从昔日的有序变为暂时的无序，特别是由于工业文明在“看不见的手”——利益的驱动下，依托商品经济和价值法则得以运行，市场经济以利益为杠杆启动整个社会，刺激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激活了整个社会。其历史的进步作用不容置疑，但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彰显，诸如金钱拜物教、利己主义导致的社会冷漠、精神生活平庸化、短期行为、欺诈坑骗的流行，等等，这又对社会提出了道德重建（包括经济伦理重建）的任务。这既是现代转型健康进行下去的必需，更是人的全

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并不限于追逐物质财富一端，他们还要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富于理性的人类其智慧也不止于“工具理性”，他们还有发展“伦理规范”、“审美情趣”的强烈要求和巨大潜能。因而“人文关怀”具有普世性和普时性，并非等到经济发达、贫困问题全然解决之后，才作为一种“奢侈品”应运而生。那种认为中国当代的首要问题是克服贫困的观点固然是正确的，但如果由此引出人文关怀在现今中国是不急之务的结论，则未必恰当。因为，人文关怀与工具理性的协调发展是文明进步的健康之路，“先物质文明，后精神文明”的割裂式安排必然导致大的社会偏颇，而且也并不符合现代文明史的实际过程。

三

现代文明肇始于西方。由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所推动，西方自 17、18 世纪以降，工具理性日益强大，而人文精神也相伴拓展，不断发挥批判者的功能，对构建健全的现代社会起到重大作用。西方在推进现代化、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 19 世纪，其思想界产生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文学界产生批判现实主义，究其底蕴，都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一旦出现病灶人们便力图疗治有关。呼唤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思潮在 19 世纪勃兴，剖析利欲扭曲人性的《人间喜剧》等批判现实主义巨著代表了 19 世纪欧洲文学主潮。这些都雄辩地说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创造着空前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不倦地探求意义世界，试图再造更加美好的精神家园。这种求索，始于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并非等到社会全面富裕以后才起步。

西方对于现代性困境的反思，在 20 世纪又有新的发展。这是因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人在“后工业时代”面对的“意义危机”，是 19 世纪所不可比拟的。一方面，现代科技大大缩短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大洋彼岸朝发夕至，信息瞬间沟通，可谓“天涯若比邻”；另一方面，人际间又日趋疏离，邻里若路人，亲朋心远隔，呈现“比邻若天涯”的局面。有的西方思想家指出，

工业社会的此类病态导源于文化与社会分离或“脱节”，导源于文化现代性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对立。^① 这种“二律背反”激起人们召唤并重新诠释人文传统，强调“两种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发展。^②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白璧德（1865—1933）认为西方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现状，其文化根源在培根（1561—1626）的物质功利主义和卢梭（1712—1778）的放纵主义的泛滥，导致现代文明专重“物质之律”而昧于“人事之律”。有鉴于此，白璧德力倡注重“人事之律”的新人文主义，“教人以所以为人之道”。^③ 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整个西方的理论界，更兴起以“人”为中心论题的研究趋向，哲学等人文学科重返“人”这一主题，这是西方现代文明在工具理性极度扩张，导致技术至上、人被物化之后的一种必然的救正性反应，其代表是法国萨特（1905—1980）所强调的存在主义之人道主义性质^④。而萨特的老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66）早在1947年发表《关于人道主义的信》中宣称：“语言是‘存在’的‘家’，在这个‘家’中居住着‘人’”。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对现代性困境的反思，集中到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肯认。他们在作这种论证时，不仅利用西方的人文主义资源，也借鉴东方（包括中国）的人文传统。这是当代勃兴的人文精神普世性的一种表现。

20世纪20至30年代，以吴宓（1894—1978）为主将的“学衡派”服膺于白璧德的“以理节欲”，追求“合度之律”的新人文主义，但在其时被视作“保守”，影响甚微。当下中国出现的人文精神讨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及学衡派的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西方二战以来形成的以“人”为中心论题的思潮的启示，笔者未作具体考察，但东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彼此间

① 见丹尼尔·贝尔：《超工业社会的到来》。

② 见C. P. 斯诺著，纪树立译：《两种文化》，三联书店1994年版。

③ 《白璧德中西人文文化教育谈。吴宓附识》，《学衡》第3期，1922年3月。

④ 见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和《辩证理性批判》。

的相互感应、彼此推引是显而易见的，其内在的逻辑联系不言而喻。对于中国人而言，一旦迈开现代化步伐，便必然在领受现代化带来的历史性进步的同时，也开始面对其引发的弊端，遂有呼唤人文关怀的努力，以救治因狭隘的功利实用主义导致的文化失范。这种努力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而先期进入这一过程的西方人的感受与思考，当然对中国人具有参考意义，这正是当代勃兴的人文精神普世性的又一种表现。不过，当下中国人思考人文问题的努力尚处在初始阶段，甚至还没有找到确切的表述方式，但却显示出现代中国人意识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故其内蕴是深长的，其前景必将是开阔的。

四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在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间开展的这场讨论，以呼唤“人文精神”为中心命题，其动因是转型时代引发出文化失范现象，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陷入迷惘无序。这不仅有赖法制健全以确立社会秩序，还寄望于伦理的重建——既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辅相成，又对市场法则给人的意义世界带来的病态影响给予必要的疗治，于是便有对中外古今“人文精神”宝库的清理、选择和重铸。然而，要将这一具有深刻历史内涵，又富于前瞻性的讨论引向深入，首先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便是，何谓“人文精神”？接下来才能讨论今日重提“人文精神”的时代针对性。

应当说，出现于当代中国人笔端、口头的“人文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人文思想”、“人文传统”，是意蕴丰富而规定性又并不确定的概念。其原因在于，作为中国古已有之的“人文”一词^①，现代用作翻译西方文艺复兴的思想主潮 humanism 的基本词

^① “诸经之首”的《周易》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名句。其间的“人文”约指人类创造的文化，与成之天然的“天文”相对应。

素，这样，“人文主义”就有了“西方的”^①与“中国的”两种含义。

发端于南部欧洲的文艺复兴，其“人文主义”由意大利人彼特拉克（1304—1374）于14世纪首先阐明，以后逐步演绎为与欧洲中世纪盛行的“神文主义”相抗衡的一种新思潮。今之西方人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是如此界定的：

人文主义无非是讲授古典文学，但是，更为适当的提法是，凡重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越性的态度，都是人文主义。从哲学方面讲，人文主义以人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人文主义从复古活动中获得启发，注重人对于真与善的追求。人文主义扬弃偏狭的哲学系统、宗教教条和抽象推理，重视人的价值。人文主义者虽然不断努力，要把基督教思想与古代世界的哲学相联系，但他们播下了宗教改革运动的种子。近年来人文主义一词常指强调个人价值而信仰上帝的思想体系。^②

概言之，西方兴起于14至16世纪的“人文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文主义”相对应，在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中，高扬人的意义，尤其强调个人价值和人的现世幸福。其思路，上承希腊的古典民主和建立在原子论基础上的个性主义，下启18世纪启

① 据董乐山考证，英文 humanism 一词是从德文 humanismus 译来，该德语是德国一位教育家于1808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的位置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 humanus 杜撰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把教古典语言和文字的先生叫 humanista，源出 humanitas，意为人性修养，文艺复兴的开启者彼特拉克在佛罗伦萨开设的古典教育课程 Studia humanitatis 包含人文学的意义。（见《文汇报读书周报》1994年7月9日第3版，董乐山：《“人文主义”溯源》）根据董先生这一语源学考索，可以认为：中译为“人文主义”的英文 humanism 一词一般赋予的四种含义——甲、人道主义；乙、人本主义；丙、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丁、从拉丁或希腊古典文化研究推引出来的人文学科研究，应以丙、丁为原义，甲、乙是引申义。

②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6卷第761页。

蒙运动的自由、平等、博爱和近世民主精神；同时又诱发了享乐主义、物欲主义，以及因现世精神的扩张而导致的终极关怀失落。继文艺复兴而起的宗教改革，其新教伦理以禁欲主义的节俭、勤业精神，号召人们在俗世创造财富以完成上帝交付的“天职”。^①新教伦理除有批判封建独断的旧教的意味之外，也包含着对人文主义走向现世享乐主义极端的一种救正。是否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的新教伦理，共同构造了西方资本主义精神，为西方文化的现代转型奠定了观念基础。至19世纪末叶以降，当西方实现工业化以后，人文主义被再度召唤，成为对工具理性和实利主义片面膨胀的“现代病”的一种反拨。

至于中国的人文传统，则颇具“早熟性”。远在周代，与殷商时期的尊神重鬼思想相对应，“重人”、“敬德”观念应运而兴。先秦典籍所谓“惟人万物之灵”^②，“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③，便是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先期表述。后来汇合成中国文化主流的儒、法诸家，都以人间伦常、现实政治为务，“舍诸天运，征乎人文”^④，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价值取向。从“远神近人”，以人为本位一点而言，中国的人文传统与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似有相通之处，故借用中国古典的“人文”二字翻译西方中世纪末期兴起的新思潮——humanism，不无道理。

然而，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人文主义并非一回事，其最大差异在于对“人”的不同理解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以古希腊的原子论和雅典学派的人论为根据，强调人是具有理智、情感和意志的独立个体，并从人性论出发，要求个性解放，摆脱封建等级观念，发展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中国的人文传统则另有旨趣，简而言之，则可作如下概括：

① 见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尚书·泰誓上》。

③ 《礼记·礼运》。

④ 《后汉书·公孙瓒传论》。

把人看成群体的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得出人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互动个体的结论，并把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贡献之类纳入这种认识中，认为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他的命运同群体息息相关。这就是中国人文主义的人论。^①

中国的人文传统渊深浩博，它展开于宇宙论、政治论、人生论、道德论、历史观等诸多领域，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色，如经验理性、侧重伦常、民本思想、富于历史感、和而不同，等等，都与其相关。同时，中国的人文传统既是“早熟”的，又是难以突破故道的，因此中国人文传统未能直接推引出近代精神，没有指向近代民主，却导致王权主义。^②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的人文传统导引出尊君主义和民本主义两翼，共同构造了中国式的专制政体。同时，中国的人文传统由于缺乏对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的必要肯认，因而难以独立提供造就现代新人的健全氛围。直到19世纪中叶以降，在新的世界条件下，中西文化碰撞、互补，引发社会及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人文传统方获得时代性变换的机遇，并构成中国现代精神的有机部分，成为汲纳、选择外来文化（包括西方人文主义）的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现代西方哲人构建新的人文精神提供启示。爱因斯坦、玻尔、普利高津、海德格尔、萨特已经从这些启示中获益，其后继者还将继续从中获益。

五

西方以强调个体价值为特征的人文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充分发挥其积极效应，同时又引发出若干弊端；中国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传统，缺乏自发走向现代的动力，却有可能在经过现

^① 庞朴：《中国文明的人文精神（论纲）》，《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② 参见刘泽华：《中国的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代诠释以后，为克服某些“现代病”提供启示。因此，不能简单对西方人文传统或中国人文传统一味褒此贬彼，而只能将它们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具体分析，并试图在现代生活实践中探索二者统合的可能性。至于 90 年代文学界时贤所呼唤的“人文精神”，是指西方式的强调个体独立的人文主义，还是中国式的强调社会人格的人文主义？或者是试图实现二者的统一：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群体的分子？当下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各方似乎各有主张，但又都没有作出系统深入的阐发。这正表明讨论尚处于初始阶段。我们在 90 年代的议论中通常见到的是在“高扬人的价值”、“重视精神文明”、“关注终极追求”、“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诸点上对西方人文主义和中国人文传统的综合借鉴，以与“物欲横流”、“道德滑坡”、“文化失范”的“时弊”相抗衡。这也许是对当下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种积极反应，当然应予肯定，但就严肃的学术讨论而言，尚有许多工作要做。

笔者不拟对时贤前一阶段努力的意义详加评析，而只想提请注意：如果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并非无的放矢、无病呻吟，而有着实实在在的社会驱动力存在，那么就应当将讨论引上健康的轨道。这需要：

其一，具体研究现代化进程在人文领域，以及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相互关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互关系上呈现的实际状态及引发的问題。有的论者归纳，当下中国处于几个不同的人文参照系统的交叉点上：第一，中国士人的儒道互补的道统与操守；第二，中国民间社会的伦理规范；第三，“五四”以来民主、科学的启蒙主义；第四，现代化造成的与世界接轨的愿望，对欧美式人文传统某些价值观念的认同；第五，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对资本主义中违背人文传统的弊端的批判。^① 这种分梳工作是有益的，但还需要深入下去，以厘清古今中西相交会的当下的人文状态。

其二，对讨论涉及的学术前史（包括所使用概念的演绎史）

^① 见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文汇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版。

作必要的反顾，如此才能“接着讲”下去，否则有可能出现因讨论诸方使用同一概念而所含内容却风马牛不相及而造成的笑话。例如，有论者立足“人文精神”以抨击时下的“物欲横流”，在义形于色之际，却很可能遭到驳诘：西方人文主义的代表作《十日谈》在谴责中世纪教会的禁欲主义时，正面宣扬的恰恰是个人物欲的合理性。笔者特别指出此点，并非反对时贤倡导“人文关怀”和制约“物欲横流”，而是希望更自觉地对人文传统作历史的观照，特别注意考察三个转型阶段人文精神具体形态的联系性与差异性：一、在文野交界之际（如古希腊、罗马、中国先秦时期），人文精神表现为在“人兽之辨”、“人神之辨”中强调人的特性和地位，表现为以人文知识教育人，如中国周代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士；古罗马以文、史、哲、数培养自由公民。二、在中世纪末期兴起的欧洲文艺复兴、中国明清之际的“破块启蒙”思潮，论证人的世俗要求的合理性，以批判神学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及专制独断论。三、在工业文明普被，向后工业文明转化的现代，与唯科学主义和拜金主义相抗衡，则有新人文思潮崛起。^①当下的人文精神讨论便是这一历史序列的自然延伸。今日的人文之议，哪些方面承袭了第一阶段的遗产，哪些方面受启迪于第二阶段的灵性，哪些方面是正宗的第三阶段论题，我们应作分层梳理，而不宜混为一谈，作超时空漫议。总之，只有在较清晰的历史理念指引下，当下的人文精神讨论才不致陷入概念紊乱、思路芜杂的泥淖，方有可能在比较坚实的地基上朝前跃动，作出创造性诠释，从而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真切可靠的思想资源。

^① 见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纲》，《学习与探索》1995年第5期。

中国人文传统五题^①

弁 言

公元 14 至 16 世纪，以复兴湮没千年之久的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为外观的“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在意大利兴起，进而扩展到整个西欧。此前，欧洲曾发生过多“文艺复兴”，如 8、9 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 世纪的文艺复兴。而这次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大文艺复兴”，具有文化转型意味，它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冲决封建罗网的要求，高张“humanism”旗帜，赞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其著名口号是：“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并由此倡导人权，以与中世纪君临一切的神权相抗衡。以此为开端，意大利各大学增设修辞学、哲学、天算学等世俗学科（即人文学

^① 2003 年为武汉大学专门史博士生授课。